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 调查报告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 调查报告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1994

[京] 新登字 187 号

责任编辑：曙 光

装帧设计：陈 余

版式设计：李 萍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报告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 千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0-5476-9/K · 171

定价：10.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报告/陆学艺编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9
ISBN 7-5000-5476-9

I. 中…

Ⅱ. 陆…

Ⅲ. 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

N. F5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94) 11564 号

前 言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社会学家合作开展的一项大型社会调查研究。它发端于双方社会科学家各自进行的两项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国的《百县市国情调查》和美国的《社会普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具体的酝酿过程，始于1991年底和1992年初我与李培林研究员赴美考察期间。那次考察中，我们与美国社会学界的同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与接触，彼此都感到在社会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而中国方面正在进行的《百县市国情调查》和美国社会学界长期进行的《社会普查》，恰好为这种合作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正是基于这种需要和基础，使我们在访美期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白威廉教授(William L. Parish)和杜克大学的林南(Nan Lin)教授草签了合作研究的意向书。以后，双方学者各自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和美国罗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终于使意向书变成了正式的协议书。1992年夏，中美合作研究的课题组正式成立。双方成员分别为，中方：陆学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何秉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沈崇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折晓叶(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美方：白威廉(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林南(教授，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白瑞德(Richard E. Barrett，

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系)、奥罗姆(Anthony M. Orum,教授,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系)。

课题组成立后,中美双方研究人员曾就抽样方案和问卷设计进行了讨论研究。首先由我和林南及白瑞德教授在《百县市国情调查》点中一起选定了十个(市)县作为调查点,它们由南向北分别是:新会市(广东省)、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杭县(福建省)、张家港市(江苏省)、新都县(四川省)、曲靖市(云南省)、孝感市(湖北省)、临夏回族自治县(甘肃省)、南皮县(河北省)和彰武县(辽宁省)。这十个点都是《百县市国情调查》的调查点。

调查点确定之后,中方课题组成员沈崇麟和折晓叶与美方就整体调查方案和村户二级调查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十个调查点进行试调查后修改定稿。定稿后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家庭关系与结构、家庭生活、工作、职业声望与流动、社会心理与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村户二级的随机抽样设计和抽样工作,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统计分析研究员高嘉陵,经与美方多次讨论后完成并实际操作的。因此,本次调查点的选择是非随机的,而村、户二级的抽样则是随机的。

在完成抽样设计后,课题组于1993年4月在北京对负责这次调查的十个地方调查队进行了培训。培训由中美双方成员沈崇麟、折晓叶和白威廉共同主持。十个地方调查队的主要负责人为:

新会调查点:詹天庠(副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室主任)

玉林调查点:邓壬富(副研究员,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上杭调查点:魏子熹(副教授,福建省委党校副教育长)

张家港调查点:蒋兆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新都调查点：李东山（副研究员，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曲靖调查点：李淳燕（副研究员，云南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孝感调查点：水延凯（教授，湖北省孝感地委党校）

临夏调查点：穆纪光（研究员，甘肃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南皮调查点：牛凤瑞（研究员，河北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所长）

彰武调查点：曹晓峰（副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

整个调查自1993年4月开始至7月结束。动员了一百多名调查人员，他们大多数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地方党校的教员。由于这次调查采取面对面访问的形式，调查人员，特别是山区调查点的调查人员，为这次调查的成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例如，上杭县地处闽西山区，有时调查人员为了完成一户调查，需要爬山涉水，往返路程多达四五个小时。在此，我仅代表中美双方课题组，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就没有这次调查的成功。

实地调查结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百县市调查数据库”课题组，在北京组织完成了数据的输入和初步检验工作。社会学研究所的陈婴婴助理研究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社会学研究所的其他一些同志也为本次调查的数据核对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是沈原、周谦、覃方明、赵平和高鸽。在此，我也代表课题组向他们表示感谢。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中方课题组成员沈崇麟和折晓叶，根据协议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与白威廉教授一起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和检验。白威廉教授在这方面的经验、学识和辛勤工作，令中方研究人员获益匪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李放和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赖蕴宽（香港）在数据整理和分析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也借此机会代表课题组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中美双方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这次调查获得了圆满成功,目前已经进入了收获的季节。第一批成果《家庭结构与农村生活》、《中国农村的新工作机会》和《经济组织与社区发展:中国农村的地方协调》等三篇报告,于199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发表,得到了较大的反响。进一步开发和使用这次调查资料的计划也正在部署之中。可以预计,这项调查不仅会使参与本项目的中美双方的社会学研究者,获取一批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随着资料在中美两国的进一步公开,还将会使更多对此有兴趣的学者、其他人士和机构,从中获益。这正是现在出版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主要篇幅是这次调查的基本统计数据,其目的在于向社会科学界和其他有关机构全面介绍调查的基本状况,提供调查的基本统计和分析数据。本书附录中收入了村、户调查问卷以及《填表说明》和《编码手册》,以便于读者了解和解读数据。另附有《统计数据编辑说明》,则为读者了解数据的编辑体例提供方便。书中还收入一篇《研究设计和初步发现》,主要对本次调查在抽样、问卷设计和初步成果中一些有特点的、值得引起讨论的问题加以说明,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本书成书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陆学艺

1994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统计资料汇编编辑说明	(1)
研究设计与初步发现	(3)
一、抽 样	(3)
二、指标设计	(5)
三、村卷与户卷资料的配合	(8)
四、一些初步发现	(9)
统计资料汇编	(18)
一、关于调查成功率和回答人的各种构成	(18)
二、问卷 A 部分	(55)
三、问卷 B 部分	(58)
四、问卷 C 部分	(76)
五、问卷 D 部分	(84)
六、问卷 E 部分	(94)
七、问卷 F 部分	(104)
八、问卷 G 部分	(110)
九、问卷 H 部分	(125)
十、问卷 I 部分	(139)
十一、问卷 J 部分	(145)
十二、村卷部分	(148)
十三、各调查点村有关设施分布情况	(190)

统计资料汇编编辑说明

为帮助读者理解资料汇编中的各种统计数据，我们在这里就资料汇编中统计数据编辑的一般原则作一说明。

一、全部统计表格中，除有关样本问题和村统计表格分列在本书资料汇编部分之首尾，并冠以文字小标题外，其余统计表格的小标题均使用每一变量在计算机数据文件中的记录类型的英文字母，即“A、B、C”等命名，如“问卷 A 部分”、“问卷 C 部分”等等。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方便读者将统计表格中的数据与问卷联系对照。

二、在本资料汇编的统计表中，原始数据中的“丢失值”和“不用答”值均已排除。因而各统计表中的总个案（或称观察值）数，会因它们原数据中所含“丢失值”和“不用答”值数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三、除个别部分的个别数据外，本资料汇编中的相对频数分布表，均以横向计算百分比。在遇有需要按纵向计算百分比的地方，我们均在资料汇编中的适当位置加以说明。

四、本资料汇编统计表中的集中和离散统计表，一般包含个案（有效个案）数、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等 5 个最常见的用以测量集中和离散趋势的统计量。

五、本资料汇编中的频数（或称次数）分布表一般均含相对和绝对次数两个统计值，无括号的数字是相对次数（百分比），括

号中的数字系绝对数（个案数）。

六、任何研究，无论设计多么完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总是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次调查也同样如此。如果读者在本资料汇编的统计表格中，主要是有关职业和行业的统计表格中，发现在原问卷中没有的类别，便是我们在原设计中忽略，而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根据地方调查队的建议，在编码和数据处理阶段增加的新类别。

七、本资料汇编每一部分的统计表格前，都有一段简单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对该部分资料的性质和统计表格中的某些技术问题的简单解释，并非分析。

八、本资料汇编的中的“调查总人口”系指问卷中 B 部分的全部调查时健在的人口。

沈崇麟 折晓叶

1994 年 6 月于芝加哥

研究设计与初步发现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大规模的、由中美双方学者共同设计和参与的社会调查，本项目在研究设计、调查组织、数据处理和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除去中美双方另文发表专题成果外，本文将对我们在调查和研究中一些较有新意的设计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以及数据分析的初步成果加以介绍。

一、抽 样

正如前言中已提及的，本项调查的抽样设计，在县、市一级是非随机的，而在县以下的村和户则是随机的。那些对抽样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书附录中的有关说明。至于本次研究的抽样结果，也已在本书的统计数据第一部分中列出，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我们要谈的，是对如何在大型社会调查中进行抽样的一些认识。

根据我们以往在中国多次实行大规模社会调查的经验，抽样中首先遇到的是抽样清单问题。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在这些国家电话普及率很高，电话号码簿可用作抽样清单，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可能。唯一可用作抽样清单的只有户籍资料。一般来说，用户籍资料作抽样清单基本上是可行的，我们在本次研究和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中都是用户籍资料作为抽样清单的。

问题在于，中国的户籍资料只记录根据户籍管理法应在某地户籍管理机关登记的人口，而不管其实际上是否在当地居住。相反，尽管有些人已经在某地长期居住，但根据户籍管理法却未记录在册。因而，使用户籍资料抽样的结果，有可能使那些已不在调查地的人进入最终的抽样名单，而使那些实际居住在当地的人无法进入抽样名单。换言之，用一份未作修正的原始户籍资料作为抽样清单，其结果总是会出现一种可称之为“流动人口短缺”的偏倚。本次调查的样本中，应该说就存在这样的偏倚。

此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当抽样单位如本调查中的村与户确定之后，还有回答人的选定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随机性原则和可操作性这两者间作出抉择。如果单纯考虑随机性原则，则只需要在选出的样本户中用随机的办法，在该户所有符合回答人规定的成员中选出回答人。这样做，可能在最终结果中有关回答人的各种分布，如年龄、性别和职业等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却会遇到选定的回答人调查时不在当地，或虽在当地却非我们所要调查项目的知情人等问题。换言之，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社会调查，特别是像本次调查这样的综合性调查中，如果只是简单地考虑随机性原则，就会大大增加调查成本，因为必须反复重访“不在者”而增加费用。更主要的还在于，由于选定的回答人并非知情者而丢失大量资料。权衡利弊，在回答人的选择上，我们未采取随机法，而是采取“偶遇法”，即在调查员访问时以该户当时在调查地的最知情人为回答人。这样做的结果，正如我们在抽样设计阶段已考虑到的，调查的成功率比较高，而回答人的分布却有一定的偏误，如在回答人的性别分布上，男性大大高于女性。

就总体而言，这次调查涉及村、户、被调查人三级，内容则涉及家庭、人口、工作、人的现代性、生活质量、社会压力、职业声望等多个方面。其中，有些方面的问题，如人的现代性、生活质量、社会压力、职业声望等，采用了国内外原有成果中的一些设计，在测量方法上并无发展。但是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中国农村地区，对这些问题的调查尚属首次，其结果无疑很有意义。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分析，除职业声望的初步分析结果已在本书中介绍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将由美方学者在不久的将来专文出版。

二、指标设计

1. 地点

地点，作为一个社会学指标，其意义不仅是对人们居住地的相对地理位置的测定，而且是对工作流动、人口社会迁移、家庭变迁和社会发展进行测量的重要指标。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户口所在地”与“目前居住地”或“工作地”乃至“出生地”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学研究和测定城乡人口流动的重要角度。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流动幅度大大增加。同一人口的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之间已经发生了分化。我们在研究设计中着眼于这种分化，强调地点指标的复合意义。地点指标中涉及了城与乡、本村、镇（乡）、县、省内外等位置要素，包括出生地、户口所在地、目前居住地、工作地等具体指标。

此外，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名著《乡土中国》，及其他有关中国社会乡土观念论述的著作中，都把“安土重迁”作为乡土观念的

一个重要特征加以阐述。根据我们以往调查的经验，深感此言之不虚。在中国农村，有相当一部分人，终其一生，竟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的祖屋。因此，我们认为，用以量度居住地的最小单位，应是本址，而非本村（本居委会）。

2. 住房

住房，在研究生活方式问题上素来有特殊的社会学意义。房屋的类型、结构、面积和设施，不仅是反映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家庭生产方式的重要指标。更具社会学研究意义的还有“房屋间数”，它对于测定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代际关系和居住生态都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产权”，是中国城乡近年日渐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城镇住房产权日益多元化，不仅表现出城乡差异，而且表现出中国特有的单位差异，因而也是研究中国所有制问题不可忽略的现象。我们在设计指标时，亦把住房作为一个综合指标体系，涉及了上述诸多方面的内容。

3. 就业身份

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地位的研究中，职业（包括约定俗成成为职业的职务）始终是其最核心的概念。这是因为职业往往在诸多表示地位的要素，如收入、教育、职权等中具有代表性和解释力。但是，这种代表性和解释力要以职业与收入、教育或职权等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特定社会的社会分化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职业。在中国城乡社会中，由于人们在行业、单位所有制、单位级别、就业形态乃至工作地点（城乡）上存在差异，使人们在取得职业的同时被赋予了职业以外的种种社会身份。我们往往会看到，具有同一职业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同为司机职业的人，国营单位司机、公

共汽车司机和个体出租汽车司机，显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实际上社会分化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依据职业而是依据身份的，是以城乡差异、单位差异、社区差异乃至集团差异为依据的。我们还可以发现，人们表述的一般职业，如“农民”、“工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的是身份而并非职业，它们包含着一组丰富的身份内涵。例如，自称谓“农民”的人，其职业往往不是从事农业而可能是从事乡镇工业生产或建筑业生产。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商品粮制度的存在，他们难以去掉农业户口的身份，因而确认自己为农民。因此，我们需要将“农民”这个就业身份或工作身份加以分解，使用一组身份指标来确定这类人员确切的社会位置。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中，就业身份体系指标包括：工作地点、行业、职业（具体做什么工作）、单位所有制、单位级别、就业形态、收入等。这些指标的交互分类分析，可以使我们较为准确地测定人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这种位置变化的基本规律。

4. “职业身份”声望

与就业身份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职业声望。职业声望一直是社会学家用来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重要指标。由于跨国职业声望比较研究，得出了多个不同制度国家的职业声望排序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的结论，一方面使职业声望作为测量指标具有了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使职业作为一个单一指标的解释力下降。特别是在一个存在较大的就业身份差异的国家里，用单纯的职业声望排序是很难测定社会地位高低的。在这里，单纯的职业失去了测量分化的意义，同样需要加入身份的概念。在与职业相关联的就业身份中，单位所有制是最具分化意义的指标之一。我们在职业声望指标设计中加入了单位等身份，构成7组“职业身份”系列。它们包括在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厂长（如国营企业厂长、集

体企业厂长、中外合资企业厂长、乡镇企业厂长、私营企业厂长等)、工人、司机、文秘,在不同行业工作的工程师,在不同层级学校工作的教师以及不同行政级别的干部。这样的设计反映了中国目前社会分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调查所得到的统计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到身份在排序中的作用。另外,100种职业身份指标的设计,参照了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和跨国比较研究采用的主要职业,因此仍然具有比较的意义。

5. 主业与兼业

非农职业在农村的大量出现,是近十余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新现象。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职业,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离开本地农村转向城市、镇或其他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另一种是仍然留在当地农村,或主从农业而兼营非农业,或主从非农职业而兼营农业。本次调查涉及的主要是后一类人员。由于农业的作息与工业或其他产业不同,如果仅从从业的时间长短和收入多少,来确定一项主业。一方面,会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非农兼业忽略,而这些兼业方式正是目前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特殊形式;另一方面,农民本人也很难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主业。因此,怎样将上述两种兼业形式都加以考察,成为我们研究设计中考虑的一大问题。主业和兼业的设计,在询问时并不要求一定严格地划分,但是无论回答者将哪个确定为主业,在主兼业上都配以从业时间和收入指标以及就业身份指标。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获得较为准确的资料,也便于研究者各自按照不同的目的使用资料。

三、村卷与户卷资料的配合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的地区差异已经深入到